



汉代 史学思想史

郑先兴 著

HANDAI
SHIXUE SIXIANGSHI

汉文化研究丛书

HANDAI SHIXUE SIXIANGSHI

汉代史学思想史

郑先兴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史学思想史/郑先兴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649-1732-6

I. ①汉… II. ①郑… III. ①史学史—思想史—中国—汉代
IV. ①K09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382 号

责任编辑 苏 娜
责任校对 胡 军
封面设计 郭 灿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3(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历史贡献及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维度	(6)
第二章 西汉前期的史学思想	(12)
第一节 陆贾的史学思想	(12)
第二节 贾谊的史学思想	(24)
第三章 西汉中期的史学思想(上)	(39)
第一节 董仲舒的史学思想	(39)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57)
第四章 西汉中期的史学思想(下)	(76)
第一节 《淮南子》的史学思想	(76)
第二节 《盐铁论》的史学思想	(90)
第五章 两汉之际的史学思想	(98)
第一节 刘向的史学思想	(98)
第二节 扬雄的史学思想	(116)
第六章 东汉前期的史学思想(上)	(130)
第一节 《白虎通》的史学思想	(130)
第二节 班固的史学思想	(140)
第七章 东汉前期的史学思想(中)	(150)
第一节 王充的史学思想	(150)
第二节 王符的史学思想	(158)

第八章 东汉中期的史学思想(下).....	(170)
第一节 赵晔的史学思想.....	(170)
第二节 汉画像的史学思想.....	(182)
第九章 东汉末期的史学思想.....	(194)
第一节 《太平经》的史学思想.....	(194)
第二节 荀悦的史学思想.....	(215)
参考文献.....	(223)
跋.....	(227)

第一章 绪 论

根据西方著名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汉代当是中国历史上的后轴心期时代。可以说,正是因为汉代史学家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中国历史的轴心期文化才得以发展。同样的,汉代史学思想史作为轴心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既承续了先秦诸子的精华,又创造了巨大的史学成绩。可以说,汉代史学思想史是汉代史学家传承创新、继往开来的结晶。由此,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学术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那么,如何科学地考察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积极推进其研究,就成为时代关注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就“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历史贡献及研究意义”与“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维度”两个问题予以分析,以作为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宏观理论指导。

第一节 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历史贡献及研究意义

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史学意识的觉醒及实践、文献资料的整理及其理念以及史书体裁的探究及成熟等三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史学意识的觉醒及实践。所谓史学意识主要是指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史学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于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整体认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用史学的话来

说就是历史观。“世界上所有的三个地区(即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①轴心期的学者意识到,人类与自然表面上是一个整体,而实际上人类很虚弱,很短暂。于是人们开始探寻自然和自身,意图寻找主宰世界的因素。用神学的话来说就是天帝,用学术的话来说就是历史规律。二是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反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思想史或学术史,用史学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史。“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人们试图通过交流思想、理智和感受而说服别人,与此同时就产生了精神冲突。人们尝试了各种最矛盾的可能性。讨论,派别的形成,以及精神王国分裂为仍互相保持关系的对立面,造成了濒临精神混乱边缘的不宁和运动。”^②轴心期的学者在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为验证自己的认识正确与否,一方面是亲力亲为,另一方面就是相互讨论、辨析。由此就形成了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潮与流派。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意见,轴心期是指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上到公元前800年,下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时期。这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诸子思想和百家争鸣的出现可谓正是史学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孔子仁与礼的思想的提出和《春秋》的编纂,标志着传统中国史学意识的成熟及实践的落实。可以说,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也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当然,道家思想的创始者老庄、墨家思想的创始者墨翟、法家思想的创始者管仲与商鞅,等等,同样也是轴心期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

有汉一代,从汉高祖开始到汉献帝延康年间结束,以公元纪年来说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前后相续425年,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时间相较,显然属于后轴心期。由此,其史学意识就具有了两重性,既有继承先秦诸子时代的特征,同时还有汉代经历秦时战火之后经典传承中的诠释和再造的过程,亦即后轴心期的特征。就继承而言,汉代史学思想史所强调的仁智历史观,如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赵晔、王符、王充、荀悦,等等,可以说都是秉持儒家的仁义观念。就创新而言,汉代史学思想所提出的天人合一、顺时而动等观念,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带有更多的时代特色。以轴心期的眼光看,汉代的史学意识极为鲜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体现了

①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②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汉代史学家对自然与人类的整体认识以及对人类自身地位的认识,“成一家之言”则可以说是对史学自身的反思。而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史学专著,积极主动地实践着汉代的史学意识。由此可见,作为后轴心期的汉代史学思想史,其学术贡献是不容低估的。可以说,没有汉代的学术,轴心期的春秋战国诸子思想是难以存继下来的。

第二,文献资料的整理及其理念。轴心期所形成的史学意识是通过文献典籍的形式保存和传承下来的。所以,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也是轴心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众所周知,孔子就是著名的文献整理专家。《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序说》:“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哀公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由此,古典文明的精神和神韵正因孔子的文献整理和编纂而得以发扬光大。

处于轴心期后期的汉代史学家们,紧跟先秦学者的步伐,不遗余力地整理和编纂文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其初衷,首先就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即整理文献典籍。根据当代《史记》研究名家张大可先生的考究,司马迁所搜集到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1)“‘爱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即阅读皇家所藏图书档案。”(2)“取资金石、文物、图像及建筑。”(3)“游历访问,实地调查。”(4)“接触当事人或他人的口述材料。”(5)“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6)“搜求被秦始皇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而其编纂的原则为:(1)“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2)“择其言优雅者,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3)“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传其书者,论其轶事。”(5)“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6)“厥协六经异传,整整齐百家杂语。”^①可见,司马迁的文献整理与编纂,有着广泛的材料来源和严格的标准,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孔子的意旨。

汉代另一位文献整理专家是刘向。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刘向将文献典籍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类予以整理。清代孙德谦《刘向校讎学纂微》考订其编校方法,有二十三条之多,诸如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

^① 张大可:《史记研究集成·第四卷·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12页。

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叙录、述疑似、准经义、征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这些总结虽不免有些繁琐,但是将刘向校书方法的资料利用得相当充分,以致后人很难再有新的发现了。姚福申先生则根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二十多种帛书中的《战国纵横家书》,与现行本的《战国策》对勘,揭示刘向编校的原则,“疏理语气,使适合当代口语”,“校正不合理的部分用语”,“增加了说明背景的文字”,“收拾残篇,补缀成章”。^①邓骏捷博士考察了刘向的文献编校的三种模式:一是“校定新本”,对汉代以前已经有的相对稳定的传本,刘向予以对勘,力求整理出完整的本子,如《论语》;二是“另编新书”,对汉代以前已经有多种传本的,刘向则重新编成“新本”,如《礼》;三是“勒成新书”,对于汉代以前已经有了某类大量材料的,刘向则对其重新编排整理成“新书”,如《战国策》。他还指出,刘向整理文献的贡献在于,“基本上结束了先秦西汉典籍的单篇流传、书无定型的散乱形态,进入勒成一书、编排有序的定本形态。这一改变使大量的先秦西汉典籍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降低了散失的机会,使典籍的保存和流布迈进一个新的阶段”。^②

司马迁和刘向作为汉代政府的官员,他们对于文献古籍的整理和编辑,不仅代表着汉代官方史学的贡献,更实际有效地保存了史学资料,为后来研究汉代及汉代之前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汉代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最主要的是凝聚在其中的理念,它构成了汉代史学思想史的核心。本来,轴心期的孔夫子整理文献典籍就是本着教育和培养人的各方面才能而来的,其史学的研究也有很强的价值诉求。“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轴心期后期,以司马迁和刘向为代表的史学家则继承其衣钵。司马迁与其朋友说其编纂文献的初衷与贡献,“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显然,这与孔子要以历史来见证执政理念如出一辙。刘向则更过之,其《说苑》《新序》《列女传》更是博采历史典故,意以表明其执政理念及经验教训,与孔子的实证史学理念相较,可谓是深得其三昧。

第三,史书体裁的探究及成熟。轴心期所形成的各种思想及流派,作为文

^① 姚福申:《对刘向编校工作的再认识——〈战国策〉与〈战国纵横家书〉比较研究》,《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

^② 邓骏捷:《刘向研究——文献学家刘向及其学术成就》,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

化传承的载体,体现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及其理念上,而作为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则体现在文献体裁的探究及形成。考中国史学发展史,如果说,轴心期的史学体裁尚未成熟的话,那么,轴心期后期的汉代史学体裁则极为丰富和成熟,可以说,汉代史学家对于史学成果的表达形式做了全面的尝试。

汉代对史学体裁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承继轴心期的史学体裁形式。

(1)《春秋》的编年体,其特征是以年代为经叙述历史事实,汉代有陆贾的《楚汉春秋》《东观汉纪》,荀悦的《汉记》。

(2)《老子》《墨子》《管子》等诸子的议论体,其特征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抒发自己的政见,汉代有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

(3)《吕氏春秋》的学案体,其特征是以集体合作的方式,集合历史文化之大成,汉代有《淮南子》。

二是汉代自身所创造的史学体裁。

(1)纪传体。纪传体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成就。司马迁的《史记》,一方面吸收先秦著作的体裁精华,一方面根据当时宗法制的政治体制内容,以历史人物为核心,设计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了纵横交错地叙述历史的新体裁。班固踵其遗续,稍稍改造,用之以叙述西汉历史,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类相较,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成为后世史学编纂的基本典范。

(2)案例体。案例体的形成是史学功用发挥的必然。以史为鉴,这是轴心期思想家的共同认识。但是究竟怎样以史为鉴?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都精通历史知识。于是为讲解历史,了解那些可供借鉴的历史事实,一些学者就将那些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例予以挑选,攒集成册。如刘向的《说苑》《新序》与《列女传》,荀悦的《申鉴》都属于这方面的论著。可见,案例体的特征是以历史事实为个案,讲解其经验教训。以今日的眼光看,案例体属于通俗史学的范畴,是后来讲史说书的先河;若追溯其根源,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可谓其源头,所不同的是寓言故事以虚构为前提,而案例体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3)时论体。所谓时论体就是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底蕴来阐明时代所提出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论体的代表之一是《盐铁论》,围绕着盐铁官营专卖问题,桑弘羊和文学贤良展开了一次面对面的讨论,在讨论中,双方据典引史,展现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卓见。二是《白虎通》,根据当时社会所提出的问题,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经典论述为规范,以关键词的方

式,予以说明解释。与案例体相较,时论体也是出于史学功用发挥的需要,是史学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体现。所不同的是,案例体更通俗晓畅,而时论体则高雅微妙,需要进行深入的论析,体现了史学的学术性和研究性。如果推究其根源,时论体当属于前述的先秦诸子的议论体。考察其差异,时论体是以集体合作、会议讨论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议论体则是以独立研究为前提;考察其相同点,两者都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趣,以历史知识为底蕴。以此而论,时论体就是议论体,它们都是今天历史论著的前身。

总之,无论是承袭先秦还是独自创造,汉代在史学体裁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和实践。其中的纪传体和时论体成为后来中国史学体裁的基本格式。

因此,深入开展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就史学学科而言,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本质特征,也有利于弘扬传统史学的精华,从而推进史学的发展;就学术史而言,既有利于把握汉代学术发展的规律,也有利于揭示轴心期中国学术的基本风貌;就世界历史而言,既有利于揭示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论定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也有利于积极推进当代民族文化建设,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节 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维度

汉代史学思想史既然贡献卓越,研究意义巨大,其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就异常丰富和火热。大致而言,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史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四章“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史学”,专门论述司马迁。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不仅论述了刘向、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比较《史记》《汉书》之异同,而且还设专节论述史学的起源与发展。金春峰先生的《汉代思想史》也有专节论述《史记》的历史观和时代精神。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第十章也论述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孙家洲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秦汉卷》在第四章文化思想中专列“史学异彩”,论述了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的史学思想。总之,思想史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仅仅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名家司马迁,而丰富的史学思想则淹没在其哲学、政治或经济等思想之中。

二是史学史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白寿彝、许殿才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秦汉卷》,论述了秦汉时期著名思想家,如董仲舒、陆贾、贾谊、桓谭、

张衡、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历史观,也着重分析了《史记》、《汉书》、《汉纪》的史学思想。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司马迁、班固的史学思想。史学史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其特点是关注思想家的历史观,重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的研究,而其不足则是对于史学本体论、史学方法论的忽略。

三是历史人物传记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王兴国先生的《贾谊评传》、王青先生的《扬雄评传》、王永祥先生的《董仲舒评传》,以及肖黎先生的《司马迁评传》和张大可先生的《司马迁评传》,都设有专节论述传主的历史思想。历史人物传记视域下的汉代思想史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传主的各方面思想,史学思想的研究萎缩了。

四是史学思想史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研究。吴怀祺先生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第二编“中世纪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三个章节,重点论述了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班固史学的两重性以及荀悦的史学思想。吴怀祺先生主编、汪高鑫著作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是专门论析汉代史学思想的专著,有汉一代的史学名家,诸如西汉的陆贾、贾谊、《淮南子》、司马谈、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东汉的王充、班固、何休、荀悦等,在这里得到了专题论述。雷家骥先生的《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着重论述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正统意识与五行观念。张秋升先生的《天人纠葛与历史运演——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现代诠释》,以历史的变动、天与历史、人与历史等话题,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西汉儒家的历史观。史学思想史视域下的汉代史学思想研究,其贡献在于考究司马、班的史学意识及其贡献,抽绎贾谊、董仲舒、王充等思想家的历史观。但是相对于汉代史学思想的卓越贡献以及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来说,毋庸讳言,目前的研究空间还是相当广阔的。

综上所述,与处于轴心期后期并具有卓越贡献的汉代史学思想史来说,无论是思想史、史学史、历史人物传记,还是史学思想史本身,其研究的实际还远远不能与之相匹配。因此,全面而深入地探究汉代史学思想史,就成为今天从事学术史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的任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所谓“器”,除了基本的历史资料和必要的文具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视域的把握。

在我们看来,史学思想史的研究维度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内在的维度,即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也可以说是史学思想的范畴;
- 二是外在的维度,即史学思想的发展路程,也可以说是史学思想发展史;
- 三是社会的维度,即史学思想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也可以说是史学思

想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如果以思维方式来观察,那么,内在维度可以说是逻辑分析,外在维度可以说是历史分析,而社会维度则是归属分析。由此,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内在维度——逻辑分析

内在维度即史学思想范畴的选择和确立,是史学思想研究的前提。内在维度客观上取决于史学研究的必要因素,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有大致相同的趋向。但在研究实践中,内在维度受制于研究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及旨趣,所以其差异也在所难免。以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为例,吴怀祺先生的研究维度集中在“一家之言”、变易观、财富观和大一统几个方面。汪高鑫先生顺应其师意,研究维度集中在天人观、变易观、大一统和史学观方面。雷家骥先生吸收西方史学理念,其研究维度集中在“新史学”(即司马迁史学的时代性)与实证主义史学两个方面。管中窥豹,可以推知,之前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不仅维度不一致,而且也过于简略。

相对而言,其他方面的史学思想研究,其内在维度要丰富些。如汤勤福先生的《朱熹的史学思想》,研究维度为历史哲学、治史态度、治史方法论、史著编纂和史学批评。赵晖的《毛泽东史学思想》,研究维度为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张文生的《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研究维度为历史论、史学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以上这些论著虽然对象各异,但是对于史学思想研究的内在维度的选择却有共同之处,且与前述汉代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相比,都没有关于内在维度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之处。

在笔者的阅读中,能够明确论述内在维度的只有王璞先生的《藏族史学思想论纲》。在第一章“史学思想的内涵”中,王先生认为,“史学思想应包括历史文学(history as literature)、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和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三个主层次的内容”。“历史文学就是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达,它体现了史家的叙事能力及文学修养,其中又含有史书题材、语言特色和叙事结构三个层次。”“历史编纂学是传统史学较具专业特色的工作,它也有三个分层次”,即“史料”“体例”与“编纂结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及史学的思考和反思,由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及考证辨伪三个分层次组成”。^①以上“史学思想的三个主层次及九个分层次”是王璞先生依据刘知幾的史学三长论的“演

^① 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5页。

绎和发展”，“且为史学思想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模式”。^① 在这里，王璞先生对于内在维度的选择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单单是注意构建史学思想研究的“整体的分析模式”，已体现出研究的实力超凡。

在我们看来，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维度，其实就是史学的基本元素，是构成史学研究行为必不可少的条件。换句话说，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史学元素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史学家的自觉和反省。由此，反过来说，构成史学基本元素的那些东西，同时也就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维度。

不言而喻，史学研究的开展，最必需的元素，从主观来说，一是研究者，即史学家；二是研究者所必备的技能，即史学方法。从客观来说，一是研究对象，即历史，或者说是历史观、历史本体论；二是体现研究对象的材料，即史料。从主观和客观的对接行为来说，一是对接的内容，即历史认识；二是对接的形式，即历史学学科，或者说是历史学本体论、史学论。由此，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维度，实际上包括了史学家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史料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学本体论等六个方面。当然，在研究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史学发展的实际，对这六个方面予以灵活的加减。

显然，根据我们所确立的内在维度，之前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尚有很多的空白，这就为我们的探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二、外在维度——历史分析

外在维度是将史学思想看成一个整体，观察其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与内在维度致力于史学思想基本元素的分析相较，外在维度则致力于史学思想学科的时代风貌研究。简单来说，外在维度主要是描述史学思想的发展路程，是一种叙述方式，可以见仁见智。因此，之前的汉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相对都比较明晰。吴怀祺先生将汉代史学思想细分为西汉司马迁、东汉班固、汉末荀悦三个时期；汪高鑫先生踵其师足，也将秦汉史学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秦统一（公元前 221 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41），其贡献是黄老思想指导下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以及历史借鉴的《新语》和《过秦论》；第二时期，从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即位到西汉灭亡，其贡献是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董仲舒思想与《史记》；第三时期，是整个东汉时期，其贡献是史学思想多元化，如谶纬中的《白虎通》，王名论中的《汉书》《汉纪》，宣汉的《论衡》，等等。

^① 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9～15 页。

在我们看来,汉代史学思想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是西汉前期,史学思想的任务是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其代表是陆贾《新语》和贾谊《新书》。

第二个是西汉中期,史学思想的任务是应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代表一是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司马迁《史记》,二是《淮南子》和《盐铁论》。

第三个是两汉之际,史学思想的任务是解决当时急剧恶化的社会政治危机,其代表是刘向的《说苑》《新序》和扬雄的《法言》。

第四个是东汉中期,史学思想的任务是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其代表一是与政府意向相关的《白虎通》和《汉书》,二是与民间旨趣相关的《论衡》《潜夫论》《吴越春秋》与汉画像。

第五个是东汉末年,史学思想的任务是解决民生与政治割据问题,其代表是《太平经》与荀悦的《汉纪》《申鉴》。

三、社会维度——归属分析

社会维度是站在他者的角度,评判史学思想的性质皈依。根据今天学术史研究的实际,可以将社会维度分为三对概念:一是所谓的学术与政治,即将史学思想史整体归为学术问题,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挥功用的社会实践,以及主流旨趣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由此,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就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观察其在两个维度间的取舍与行进。二是所谓的国家与社会,即将史学研究看作社会活动,而其课题的选择、观点的确立与功用的发挥都受制或影响于政治权力。由此,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考察其在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谐统一,而其研究维度则分别是史学思想史之外的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三是所谓的官方史学与民间史学,即将史学思想史的发展,按照其载体的社会阶级身份,界定其隶属于官方或民间。由此,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考察史学思想的归属,而其维度则是取决于史学家的官方或民间身份。从实而论,社会维度的选择,是研究者自身所要考虑的事情,不能整齐划一。但是据笔者看来,学术与政治的分野,很难清晰。学术政治化的普遍性与政治学术化的时代性,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或者说是最基本规律。因此,将学术与政治作为社会维度的研究基点,不是很准确。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同样也很难清晰。任何国家都建立在社会之上,任何社会也都以国家为标志;细而究之,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虽然有所差别,但是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因此,将两者作为社会维度的研究基点,考察学术思想的归属,显然是不合适

的。官方与民间的分野,即根据学者社会身份的阶级差异来界定其学术性质,相对来说,研究基点和学术归属都是异常明晰的。同时,也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将社会维度定位在官方和民间两个研究基点上。

总体上看来,汉代史学思想史中,属于官方史学的有陆贾、贾谊、刘安、司马迁、桓宽、扬雄、刘向、班固、荀悦;属于民间史学的则有董仲舒、赵晔、王充、王符、汉画像与《太平经》。官方史学数量较多,多集中于西汉;民间史学数量较少,多集中在东汉。就汉代史学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来说,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民间史学,都将史学的性质定为政治学。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民间社会政治觉悟要比西汉高得多。

第二章 西汉前期的史学思想

西汉前期的史学思想,继承秦末汉初的政治鼎移,其研究任务是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代表是陆贾《新语》和贾谊《新书》。就历史观而言,陆贾、贾谊都认为,历史是发展、进步的,是杰出人物所创造的,而真正推进历史进步的是仁义观念。陆贾说是“圣人怀仁仗义”,贾谊说是诸侯“修之以政而兴之以义”。就史学性质而言,陆贾、贾谊都认为,史学的本质就是政治之学,是政治统治的一种谋略。《新语·术事》:“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贾谊在《过秦论(中)》说:“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务在安之而已矣。”就历史认识而言,陆贾认为,其本质就是在“仁义”学说的指导下,全面地分析考察各种情形,以寻求历史前进的法则;贾谊则认为,依据历史人物心态变化就可以推知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史学方法论上,陆贾和贾谊都秉持历史辩证的方法,主张依照历史发展的实际,用矛盾的观点分析考察之。就社会角度而言,陆贾和贾谊都是汉代朝廷中富有历史知识的重臣,其论著的初衷,也是为汉代朝廷服务的,所以两者都具有官方史学的性质。

第一节 陆贾的史学思想

也许是“逆取顺守”的建议得到刘邦的采纳,而使其保有汉朝四百年的基